济宁之最

以忍为土以义作肥的百忍堂张氏

张现涛

在鲁南苍茫的群山中，邹县香城小河圈村的《古邾百忍堂张氏族谱》，虽早已湮灭于岁月的长河，但“百忍堂”3个字，却在烛火中流转着千年光辉，如同黄河水底沉沙里闪烁的金粒，折射出穿越时空的图谱。

当地张氏于清朝末年迁自邹县看庄林前庄村，而林前庄村张氏则来自曲阜县孔林前的张阳村，系著名的“铁锅张”——分食十道的张公艺的后人。

从轩辕黄帝之子挥公的弓矢破空，到汉留侯张良的运筹帷幄；从唐代张公艺九世同堂的百忍传奇，到后梁年间张姥姥大义救孔的义薄云天，这条血脉始终交汇在“忍”与“义”的经纬。

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曲阜孔林前那片曾被圣贤荫庇的张家林，仿佛看见中华文明最本真的生命形态——以隐忍滋养根基，以道义催发新枝，在时光的褶皱里绽放出永恒的人性光芒。

九世同堂的文明密码

唐朝麟德二年（665）的那个春日，高宗李治的銮驾碾过北国大地的黄土。在郓州寿张县，一座看似寻常的宅院里，九代人共同生活的奇迹令帝王驻足。

张公艺在御前挥毫写下一百个“忍”字时，他展现的不仅是治家智慧，更是一种文明存续的哲学。高宗当即封张公艺为醉乡侯，封张公艺的长子张希达为司仪大夫，并亲书“百忍义门”4个大字，敕修百忍义门。这个将“忍”字镌刻在祠堂匾额上的家族，深谙农耕文明最本质的生存法则——正如冬麦在霜雪中积蓄力量，他们懂得在忍耐中培育生机。

在张氏大宅的日常中，“忍”不是消极的退让，而是动态的平衡艺术。晨光熹微时，300余口人井然有序地取水炊爨；暮色四合之际，九代人围坐讲习《礼记》的诵读声穿透雕花窗棂。他们用“忍”化解代际差异的坚冰，老者不以辈分压人，少者不以新潮僭越；用“忍”调和性格的棱角，刚烈者学会克制，怯懦者懂得坚持。这种集体生活的智慧，恰如鲁地特有的夯土墙建筑——以柔韧的秸秆调和刚硬的黄土，在相忍相让中筑就风雨不摧的家园。

张公艺书房中那方洮河砚，见证过更深的思考。当帝王问及治家秘诀时，这位智者没有讲述森严的家规，而是说出了“父子不忍失慈孝，兄弟不忍外人欺，妯娌不忍闹分居，婆媳不忍失孝心”等一连串的语句。

这种将儒家伦理转化为生活实践的智慧，让“百忍堂”成为活着的《齐民要术》。在这里，“忍”是礼乐文明的具象化，宴席座次体现长幼之序，田亩分配遵循公平之道，甚至孩童嬉戏也暗合揖让之礼。九世同堂不是简单的数字累积，而是文明基因在代际传递中完成的螺旋式升华。

义薄云天的文明守护

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总有一些瞬间，因普通人的义举而永恒。后梁乾化三年（913）的那个血色黄昏，张阳村张温家的柴门被叛军叩响。一个关乎华夏文明存续的抉择，摆在了这个农家面前。

当乱孔罪魁孔末的追兵杀掉孔府主人孔光嗣后，为斩草除根，索要其独生子——襁褓中的孔仁玉时，孔仁玉的外祖父母张温夫妇毅然以自己的亲子相代，用最朴素的义举，完成了对文明最崇高的守护。

这一抉择，绝非一时冲动。在儒家文化浸润千年的土地上，“义”早已融入百姓的血脉。张温夫妇或许未曾读过《论语》，但“见义不为，无勇也”的训诫，已化作他们的人生信条。面对屠刀，他们想到的不是血脉亲疏，而是圣裔存续对文明传承的意义。这种超越血缘的道义担当，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。

张家的义举，在历史深处激起涟漪。孔仁玉得以幸存，使孔子血脉得以延续，儒家文化得以传承。这个农家的选择，不仅拯救了一个家族，更守护了整个文明的未来。松柏深处，张温夫妇的墓碑与圣贤比邻而立，昭示着草根之“义”与庙堂之“道”的水乳交融。

在孔氏后人孔德懋的《孔府内宅轶事》中，有着这样的记载：“孔仁玉为了报答张妈妈舍子救命养育之恩，奏请皇上恩准孔府认张家为世代恩亲，张家的世世代代都算是孔府家的恩人。张家的后人不管哪一代到了孔府，都必须以贵宾相待，如有不周到的地方，就是触犯家规祖训。从此孔府上下和孔氏全族都统称张妈妈为‘姥姥’，这姥姥就成了张妈妈的官称。孔仁玉还赐给张妈妈一柄楷木制的龙头拐杖，就像佘太君的龙头拐杖一样，可以用来管教孔府的衍圣公的一品夫人。还规定，张妈妈死后，这姥姥的官称和龙头拐杖由长房儿媳继承，世代相传。

为了纪念张妈妈，在曲阜城外的张阳村附近封了一小片树林，叫张家林。另外在孔林历代衍圣公都要给张妈妈立‘报恩碑’，每逢祭祀孔仁玉的时候，要有张家嫡孙二人来陪祭，有时还委托张家代替衍圣公去孔林扫墓。”

今天，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，张家的义举依然闪耀着人性的光辉。它告诉我们，文明的传承不仅依靠圣贤的智慧，更需要普通人的担当。在历史的关键时刻，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守护者，用最朴素的义举，铸就了最坚固的文明基石。

当张家林与孔林比邻而存，昭示的正是“小传统”与“大传统”的水乳交融——民间道义守护着庙堂文明，草根智慧滋养着经典传承。

家风吹绿的文明原野

迁居邹县看庄的张家后人，将“林前庄”作为新家园的称谓。这不是简单的地理标识，而是将救孔之义转化为生存哲学的宣言。在“林前庄”张家的祖训中，有着这样的条款：“遇饥荒开族仓先济邻姓，见孤老须奉养不分子侄。”把当年庇护文明的壮举，细化为日常生活的慈悲。当张家女儿出嫁时，族长会在嫁妆中放入一包从故乡带来的黄土，这不是迷信的符咒，而是将“义”的基因注入新生命的文化仪式。

清朝末年，张公兴诗背着铁锅踏上迁徙之路时，估计香城小河圈还是一片荆棘丛生的荒滩。这位太学生出身的始迁祖，在族谱扉页一定会郑重地写下“忍为立身之本，义乃处世之纲”几个大字。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。当第一季麦浪染黄河滩时，“忍”与“义”已在这片新家园生根发芽。

据说，早已被拆除的小河圈张氏的庭院，布局暗藏玄机：正屋台阶九级，暗合九世同堂的遗训；东西厢房等长，象征公平忍让的家风。廊柱上镌刻的“百忍歌”，孩童开蒙时不是机械背诵，而是在春耕秋收中体悟每个“忍”字的深意。老人常晨起扫街的习惯，源自“忍让邻里”的家训；青年外出求学经商的行囊里，必定带着包有故乡泥土的“义字锦囊”。这些生活化的传承，让古老训诫始终保持着血脉的温度。

2021年孟冬，在小河圈村集体用拖拉机整修农田时，意外地耕到了张氏家族的3块石碑。后经族人辨认，正是始迁祖张兴诗和其曾孙“张善人”等的墓碑，上面清晰标注“公字雅九，皇清太学生”，并完整地记载着张氏家族的世系传承。

据村民回忆，这些墓碑推倒后，被当成了铺路架桥的材料。雅九公在自己的身后，仍带领后人实践着“忍”与“义”的信条。晚辈要做的当然是“谨备清酌牲醴，重立于祖林之次”，让其依然垂示后昆。但在心中，默记着这样的一副家族对联：“情存善念大义救孔宅邻邹鲁圣贤第 心怀百忍九世同堂源本清河故人家”。

夕阳将张家林的碑影拉得很长，那些镌刻着“忍”和“义”的古老文字，或许正在智能手机屏幕上焕发新光。从挥公制弓到张良扶汉，从公艺治家到姥姥救孔，这条流淌了数千年的文化长河，始终在“忍”的河床与“义”的波涛中奔涌向前。

当小河圈的张氏孩童在门前朗读新编的《百忍歌》时，那些曾被帝王旌表的古老美德，正化作滋养现代文明的春泥；那些凝聚在族谱里的精神基因，正在新时代的土壤里生长出更蓬勃的文明形态。

这或许就是“百忍堂”给予的启示，真正的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青铜器，而是永远鲜活的生存智慧，是在坚守与创新中永续的文化生命。

①香城镇小河圈村远眺 ■徐士刚 摄影
②张氏先祖挥公像③张公艺像④曲阜张姥姥塑像⑤小河圈村新发现墓碑 ■资料图片

济宁我家乡

有个男孩名字叫榆钱儿

张辉

小时候，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小学校，校园里那棵歪脖子柳树上挂着一只铁铃，上学放学老师都会去打铃，附近的人家也是听着铃声判断时间。

放学后，我会盯着家里的老榆树看。榆树上每年春天都会结出一串串榆钱，这是春天给我们的零食。

我们班有个同学小名叫榆钱，他身体敏捷，能爬高，会游泳。村里的榆树结满榆钱的时候，他都会爬树采摘，几乎所有的榆树他都会摘个遍。大人当然不会生气，只是交代他要小心。甜丝丝的榆钱吃到嘴里，是一种无法替代的幸福感。等我们尝够新鲜，大人们才来撸点榆钱回家烧粥喝。

童年的时光很长也很短，那个夏天，榆钱为了救起一名落水儿童，再也没有爬上岸。那个小孩得救了，一向水性好的榆钱，永远地告别了同学们。那天，榆钱再也不来上课，同学们默默地走到他的座位前，拿出钢笔，在他的课桌上滴了一滴墨水。这种离别有一种疼，疼得没有一点声音，只有同学们不约而同地把一滴滴墨水留在他的课桌上。

从那以后，每个春天我们似乎忘记了摘榆钱吃，就好像忘记了那个男孩爬树摘榆钱的场景。若干年后，我发现村里再也没有小时候给我们解馋的榆钱树，童年吃过的榆钱，常常在春天被唤起。

榆钱和他那张滴满墨水的课桌永远留在记忆里。

屋后栽的榆树

焦峰修

阳春是家乡采摘榆钱的季节，每到此时，总能想起老家榆钱的香味。

老家的房前屋后，有10余棵小榆树，春光里早早地吐出榆钱儿，绿绿的，坠成了串儿。小时候爱爬树，常爬上去撸榆钱儿吃，边嚼边往衣兜装，嘴里香甜，心里也欢喜。下了树，也分给伙伴们。榆钱儿又鲜又嫩，伙着吃最有滋味。

等到吃腻了，就不再拿榆钱当零食了，踩折了树枝嬉闹追逐，乱舞一气，撒了一地榆钱儿。奶奶见了，把我叫到跟前狠狠地训斥了一顿，跟我讲她小时候做榆钱儿蒸饭吃。遇上饥荒，榆钱儿撸光了，就吃榆叶。榆叶吃完了，就撕树皮，碾碎磨成面吃。

我长大后，知道了榆钱实在不简单，在饥荒的岁月里不知救活了多少父辈人。屋后栽榆，是图吉利，以榆盼余……余粮，余钱。

饥荒的年代已成历史，但每次回到老家，我都要去老家屋后的榆树旁，撸一把榆钱塞到嘴里，品味一番。

发现

大禹治水始在“蜀”

李德显

《三皇本纪》记载：“（人皇）兄弟九人，分掌九州。各立城邑，凡一百五十世。”《路史》记载：“蜀为之国，肇于人皇。”《洛书》曰：“人皇始出，继地皇之后，兄弟九人分理九州，为九囿，人皇居中州，制八辅。”《河图括地象》：“正中冀州曰白土，白犹素也。”这说明了人皇居中州（即中冀），而上古时期的中州为“蜀”。

那么“蜀”在哪里？《大清一统志》记载：“蜀山，在汶上县西南四十里，其下即蜀山湖。四望无山，屹立波心。《尔雅》：‘山，独者。’故名。”山因孤峙而名“蜀”，民居其山而称“蜀山氏”，名为蜀。《左传》也记载了位处东方的一个“蜀”字地名。晋代经学家杜预注称：“蜀，鲁地，泰山博县西北有蜀亭。”正如《史记》记载的那样：“昌意娶蜀山氏之女昌仆为妻，生有一子颛顼。”而颛顼又生鲧，鲧后为禹。

上古时期，最重要的“都”是冀都，因为史书中反复出现“冀”，也是上古帝王居住时间最长的“都”。《谷梁传·杨士勋疏》云：“冀州者，天下之中州，自唐虞及夏殷皆都焉，则冀州是天子之常居。”这里指出尧、舜、夏、商时期的都城在冀州，为天子经常居住的地方。顾炎武曾指出，“古之天子长居冀州，后人因之，遂以冀州为中国之号。”也有学者认为，“冀州”即所谓的“中土”，是当时文明发展的核心区域，被称为“王化的四渎之域”。

史料显示“中冀”古指“冀州”，也就是涿鹿地区，是人们常说的黄帝杀蚩尤的地方。晋皇甫谧《帝王世纪》：“黄帝杀蚩尤于中冀。”中冀在哪里？按现在的说法是北京西北的河北涿鹿。而上古时期的涿鹿还属于未开发地带，黄帝和蚩尤不可能去争荒无人烟之地，理应在土地肥沃、物产丰富的地区征战。那么再看上古的汶泗流域，这里经过常年的河水冲刷，植被茂密，水源充足，适宜农耕，蜀族先人又植桑养蚕，加之金属农具的使用，各部落内过着富足文明的生活，这里也应是部落必争的战略要地。

那么涿鹿又是哪里呢？在更早的周代文献《逸周书》里就是这么写的：“昔阪泉氏用兵无已……徙居至于独鹿，诸侯畔之，阪泉以亡。”阪泉氏就是炎帝，他迁徙到了独鹿，诸侯们背叛了他。可见周朝人认为：涿鹿实为独鹿。“独”字的繁体字写作“獨”，所以，“涿鹿”在周代实为“獨鹿”。到了西汉司马迁时，才被误写为涿鹿。

这么看来，“獨”通“蜀”，有湖名为蜀山湖，亦作“独山湖”。而“鹿”，古通“麓”。麓的意思是山脚下，而“独”古写作“獨”，独鹿，古写就是“獨麓”，也就是“蜀麓”，意为蜀山脚下。《逸周书》中写的独鹿之战，就发生在山东汶上县蜀山下。黄帝就是在这个地方生擒了蚩尤，并在这里杀的。

《竹书纪年》：“（禹）三年丧毕，都于阳城。元年壬子，帝即位，居冀。”说明大禹在阳城避舜之子商均，之后在冀称帝。这句话，也同样说明大禹曾以冀州为都。

由此看来，冀州就是上古时期的蜀。《史记》说大禹治水从尧所在的冀州开始，而当时尧正在执政，所以大禹开始治水是在冀州，也就是“蜀”地的汶泗流域。大禹在这里治水成功后，又在其他地方用疏导的方式治水。

鲁西南“蜀”地是蚩尤的重要活动区域，又是上古时期最早冶炼金属区域。金属可铸造农具用于耕种，还可以锻造兵器，后人也可用金属农具挖渠和劈山排水。金属农具的广泛使用，理应为大禹治水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再从地望上讲，距蜀山不远，有东皋、西皋地名，相传是皋陶居住的地方，是协助大禹治水的一员大将。梁山、东平、汶上三县交界处又有古阳城（也称阳谷城），在今汶上县郭楼镇有阳城坝村，又称鱼鸣城（禹名城），该处为古济水支流到大野泽的分水口，两村中间有一土坝，相传为大禹治水时期所建。这些地望和遗址，也为大禹治水在古蜀地提供了有力的证据。

地名杂坛

金乡山，感念善行义举的地名

高爱国

东汉时期，山阳郡昌邑（今巨野县大谢集镇前昌邑村）人鲁峻，字仲岩（一作仲严），出生在官宦世家，其祖在朝里任监营谒者，其父做修武县令。他从“举孝廉”步入仕途，先后担任过郎中、谒者、河内太守丞、司徒、司空府、御史、东郡顿丘令、九江太守、议郎、太尉长史、御史中丞等官职，最高做到司隶校尉。熹平元年（172），病死在任上。

鲁峻为人敦厚淳朴，待人接物谦逊有礼。他博览群书，学富五车，才高八斗，精通《鲁诗》《颜氏春秋》，一言一行都遵循儒家道义。在家孝敬父母，在外尊老爱幼，受到乡邻的一致称赞。

鲁峻成年后被推举为孝廉，从此踏上仕途。他恪尽职守，廉洁奉公，得到上司的盛赞，官位越升越高。汉桓帝延熹七年（164），他被委以司隶校尉，专门负责监督皇帝和百官的一言一行。鲁峻秉公执法，刚正不阿，对待奸邪小人从不手软，朝廷现出清正廉洁的吏治环境。

熹平元年（172）夏，鲁峻偶感风寒，倍觉身体不适，遂向汉灵帝刘宏告假，虽然吃了很多药，病情却一天天加重。他料知将不久于人世，就叮嘱儿子说：“我死后，要埋葬在老家。昌邑东北有很多山，其中有一座神农山，风景秀丽，是一块风水宝地，就让我在那里安身吧。”

鲁峻的儿子就到昌邑东北寻找这座山，确定位置后，立即雇人开山建墓。起初墓地选在山北，第一天挖土时，工匠感觉有腥气冒出。挖了三尺多深，遇到一块大石头，费了很大劲才用大铁镐刨出来，石头下的东西却让人毛骨悚然。只见上百条白蛇缠在一起，大的有胳膊粗细，小的如筷子一样，头高昂着，吐着血红的舌信子。

蛇皆为银白色，通体透明，在阳光下犹如一条条白练耀眼夺目。工匠们赶紧用土埋上，另选新址。在离开几十丈远的地方接着施工，刚挖不久却有一只只白兔从山石里窜出来。人们都感觉不吉利，谁也不敢再挖石头了。

鲁峻的儿子赶紧请人来看，那人让他向南选址。说也奇怪，新地方石头虽然很硬，工匠们做起来却很轻松。他们挖到了一个大箱子，赶紧告诉了鲁峻的儿子。十几个人把箱子抬上来，打开了一看，满箱子黄金，里面还有一张写着字的黄纸。鲁峻的儿子接过来，只见上边用篆文写着4句话：帝王将相满朝臣，宝山留给汉鲁俊。白龙玉兔出现日，千两黄金赠贵人。

经过清点，黄金每锭50两，共20锭，不多不少，正好1000两。鲁峻劝告儿子说：“黄金不是咱的，都捐给昌邑的贫困老百姓吧。”

就这样，千两黄金都送给了贫困百姓。鲁峻的善行义举感动了人们，在他殡葬时，昌邑百姓悲痛不已，扶老携幼送了一程又一程。为了感念鲁峻，人们就把“凿山得金”的神农山改称为“金乡山”，简称“金山”。不久，东汉在这里设金乡县，地名沿用至今。

北魏郦道元《水经注》记载：戴延之《西征记》曰，焦氏山北数里，汉司隶校尉鲁峻穿山得白蛇、白兔，不葬，更葬山南，凿而得金，故曰金乡山。山形峻峭，冢前有石祠、石庙，四壁皆青石隐起，自书契以来，忠臣、孝子、贞妇，孔子及弟子七十二人形像，像边皆刻石记之，文字分明，又有石床，长八尺，磨莹鲜明，叩之声闻远近。时太尉从事中郎傅珍之、咨议参军周安穆拆败石床，各取去，为鲁氏之后所讼，二人并免官。焦氏山东即金乡山也，有冢，谓之秦王陵，山上二百步得冢口，堑深十丈，两壁峻峭，广二丈，入行七十步，得埏门，门外左右皆有空，可容五六十人，谓之白马空，埏门内二丈，得外堂，外堂之后，又得内堂，观者皆执烛而行，虽无他雕镂，然治石甚精，或云是汉昌邑哀王冢，所未详也。

家国天下

孙厚庭的寻根之旅

付道峰

微山湖西畔有一段寻祖认宗的佳话。清咸丰年间，黄河决口，山东郓城、巨野、嘉祥等县的民田多被大水淹没。为了生存，村民扶老携幼，四处逃荒，寻找立足谋生之地，来到微山湖西岸。

清咸丰三年，巨野县的张双龙、张玉起父子，也随这东迁的洪流，来到微山县赵庙镇曹庄开垦荒田种地。张玉起育有二子，长子不详，次子张端午。时局动荡，战乱纷出，张双龙战亡，葬在曹庄。孤儿寡母只有沿路乞讨，积贫无奈，为了孩子能存活于世，张氏将7岁的张端午卖给孙家作“押子”，改名孙厚庭。

“押子”是一种封建习俗，认为婚后久久不生育的夫妻，抱养一个别人的孩子，就能尽快怀孕生下亲生骨肉。还有一种说法是，押子是给主家的孩子挡灾的，有苦有难都落在押子身上，押子一般身世都比较凄苦。孙家生了儿子之后，孙厚庭就被孙家分出，在沿湖一带打零工，备尝人世艰辛，后娶妻闫氏。

生活让孙厚庭历尽磨难，也赋予孙厚庭坚韧的品格，他更能体会劳苦百姓的艰辛，也激发了他想要改变生活境遇的信念。

沛县是革命老区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孙厚庭接触到了共产党的一名地下工作者，深切感受到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信仰。自此，他积极为地下党工作，带领当地群众打土豪分田地，后成为区委农委干部，雷厉风行，革命坚决，方圆数十里的敌人闻风丧胆。

1949年2月，孙厚庭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。解放后，他任当地农会会长，兢兢业业，不畏劳苦，一切以群众利益为重，屡获省市级先进荣誉。在他身先垂范之下，3个儿子走上参军报效国家之路，一为师级干部，一为团级干部，孙子也先后入伍，全家15人为党工作，是远近闻名的革命家庭。

在轰轰烈烈为革命工作之时，一件事始终萦绕在孙厚庭的心头，那便是找到自己的根，自己的老家亲人究竟在何处。仅凭着儿时一点记忆，他开始了寻根之行。

孙厚庭筚路蓝缕，玉汝于成，终于在张奉民等族人的帮助下，找到了自己老家族亲。借用其子孙庆武所述“吾父高义，数赴巨野、沛县查访，寒来暑往，不辞劳苦，幸得天佑，终觅张氏祖辈，后与族人交好。”

“寒来暑往”短短4字中间，包含何等艰辛，寻祖之心何等热切。对于一个家族而言，孙厚庭老先生是让子孙后代知其根源，慎终追远；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讲，这就是对故土山河的兹兹之念，也就是我们所要秉承的家国情怀。